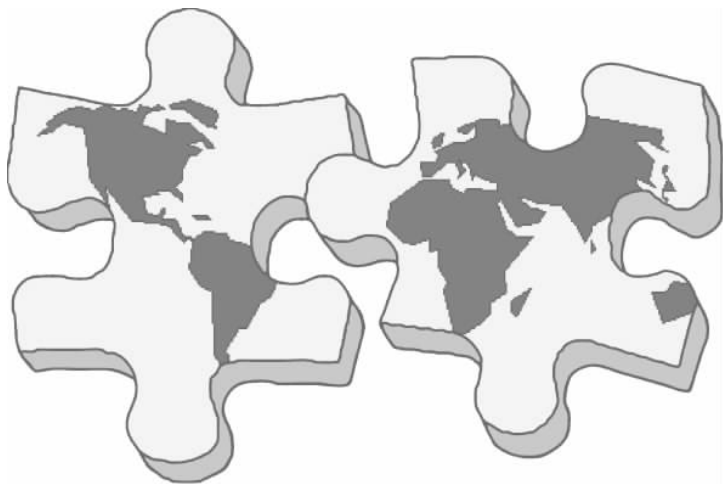


旅游管理新教材丛书

旅游投资项目评价

崔卫华 编著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 连

© 崔卫华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旅游投资项目评价 崔卫华编著 大连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旅游管理新教材丛书)
陈子昂原书, 陈子昂原书, 陈子昂原书

I 旅... II 崔... III 旅游 投资 项目评价 高等学校 教材 IV 经济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456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16023)

总 编 室: (0411) 84796000

营 销 部: (0411) 84796001

网 址: 网址 // 增值网 增值网

读者信箱: 读者信箱 读者信箱

大连理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字数: 100千字 印张: 10

印数: 1—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田玉海

责任校对: 毛 杰

封面设计: 钟福建

版式设计: 孙 萍

定价: 10.00 元

序 言

应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之约，我为“旅游管理新教材丛书”作序，深感受之不安，但又恐却之不恭，踌躇再三，只好应命。

中国的旅游研究、旅游教育和旅游产业同步兴起，如今已届 员源 世纪。就其发展的时间而言，似乎还不能尽脱乳臭。但就其成长的速度而言，已经可以窥见其青春风貌。借助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经过诸多前辈的筚路蓝缕之功，我们这些后生今天有幸感受到了一个滚滚而来、泱泱泛漫的旅游热潮。这个热潮也浸润着旅游的学术研究，使这个园地蕴蓄着勃勃生机，成了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花。可以预见，旅游的学术研究会伴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相信，体验经济是第三次浪潮之后的重要经济形态——而更加如火如荼。

检视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我们会高兴地看到，她已经一点点培养起了良好的学术品质：开放、活力、进取和宽容。这种品质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旅游现象的性质和特征是其温床，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相对落后于世界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发展实践的要求是其动力，而旅游学术队伍的多元化和年轻态是其实现的平台。有了这种品质，我们就能够理解，学术界的同行们在短短二十多年中精心而艰苦地构筑旅游学术大厦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林林总总的学术著作。不用说，我们不仅要感谢这种百花争艳的氛围，我们也要感谢这种数量的快速积累。它们是酝酿旅游学术研究跨越新的台阶、实现质的飞跃的基础。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和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多年来也始终与这个潮流同行。在推出了深得好评的“高职高专旅游与饭店管理专业教材新系”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本科教材的建设，邀请名

家，推举专家，遂成就了现在这套“旅游管理新教材丛书”。丛书的初衷是力求反映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崭新的视角透视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国内外宏观环境问题以及微观运行问题，并以新颖的结构方式处理本科教材的相关内容，从而使这套丛书既有学术意义上的开放与出新，也有大学本科教材的严谨和规范。事实上，丛书的各位作者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实践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正如前文所言，我们希望她成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和教育园地的一朵有特色的小花，或者成为旅游学术研究大厦的片砖片瓦。

是为序。

谢彦君

圆年春，于东北财经大学

前言

旅游投资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入世后中国旅游业正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领域综合化和投资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与旅游业起步阶段供给短缺相比,需求扩张拉动的旅游投资活动具有更强的市场指向,因此,必然要求旅游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作为旅游投资决策和旅游规划重要一环的旅游投资项目评价,其方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项目评价的核心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一方面,随着 20 世纪中叶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推广,项目评价方法于 20 年代初传入我国,并逐步得到认可并受到广泛的重视;另一方面,项目评价也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援助的一个必要条件。

项目评价方法在我国主要应用于工业项目的评价,并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方法体系。由于旅游投资项目的特征和大规模旅游开发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建立和完善不同于工业项目评价方法的旅游投资项目评价方法体系已是实践的迫切需要。产业的成熟有赖于理论先行,本书就是根据 1994—1995 年间我讲授《旅游投资项目评价》一课的讲稿整理而来的。作为一本阐述旅游投资项目评价原理和方法的教科书,既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更有助于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旅游投资项目评价中的若干基本经济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便根据旅游投资项目及评价方法的特点,对旅游投资项目评价的方法体系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

世界银行的专家曾强调指出,每一个项目评价都是一次独特的研究过程,绝不是千篇一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程序化决策,较粗略地然而敏锐地分析往往比在某些方面过细地计算显得更加必要。已有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对一个地区的所有项目或对不同地区的同一类项

目提供理想的答案，因此，那种认为项目评价方法已经是一套成熟而完全可靠的计算程序，只需把数据输入，就会得出合理判断的想法是幼稚的。在我国，旅游投资项目评价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可以借鉴的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面临着许多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讨和完善的新课题。

本书不仅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旅游规划和旅游经济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旅游投资项目评价》课程用书，还可以作为旅游规划和旅游经济专业的管理人员培训和自学用书。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谢彦君副院长和编辑朱艳女士的大力协助，在资料收集方面也得到了梁春媚老师和石秀云老师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在此也向原作者致以真诚的谢意。

限于作者的学识和水平，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联系方式：悦兮缘岳海泉群。

崔卫华

圆园园年 圆月

于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目 录

第 1 章	项目评价的历史发展	1
1.1	传统成本效益分析阶段	10
1.2	现代成本效益分析阶段	24
1.3	项目评价在我国的应用	24
第 2 章	项目评价的静态分析	35
2.1	资源的静态效率	44
2.2	成本效益的内容	50
2.3	成本效益的度量	50
第 3 章	项目评价的动态原理	61
3.1	动态成本效益的计算	82
3.2	资源的动态效率	90
3.3	项目动态分析的应用	90
第 4 章	旅游项目评价的内容	97
4.1	旅游项目评价的对象	111
4.2	旅游项目评价的程序	121
4.3	旅游项目评价的内容	121
第 5 章	旅游项目的评价指标	139
5.1	财务指标的计算	154
5.2	经济指标的计算	164
5.3	社会指标的分析	164

第 远章	旅游项目的环境评价	181
6.1	环境的成本效益	181
6.2	市场评价法	189
6.3	替代市场法	196
第 苑章	旅游项目的风险评价	226
7.1	盈亏平衡分析	226
7.2	敏感性分析	238
7.3	概率分析	249
第 愿章	旅游投资方案的比选	257
8.1	投资方案比选的类型	257
8.2	方案比选的一般方法	266
8.3	方案比选的特殊方法	273
主要参考文献		285

项目评价的历史发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熟悉西方项目评价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明确现代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标、理论体系和特点；了解项目评价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存在的问题。

第

1

章

旅游投资项目评价
项目评价的历史发展

员

在经济学中，项目评价与成本效益分析是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大多数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都采用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其主要的绩效评价方法。从项目评价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项目评价或成本效益分析的历史。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在一开始时是相互独立的，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才逐渐融合到一起。

项目传统成本效益分析阶段

项目评价的理论起点

“消费者剩余”思想的提出

项目评价的理论可以追溯到 1874 年法国工程师杜波伊特（~~1874~~ 年）发表的《论公共工程项目效用的测算》。杜波伊特最重要的贡献是他首先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思想并作出了关于消费者剩余的几何图形解释。杜波伊特认为，消费者剩余是指一个消费者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时，他的最高支付意愿与其实际支付的差额部分。他指出，公共工程的效益并不等同于公共工程本身所产生的直接收入。一个公共项目的净产出额乘以相应的市场价格等于消费者的实际支付量，就是该项目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下限，即项目的最低社会效益，而项目的全部社会效益则等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支付意愿与实

际支付量之差可以用来衡量所谓的消费者剩余。某些消费者因该项目的产出而分享消费者剩余的增加量，因此，项目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下限与消费者剩余的增加量之和就是全社会由该项目所得到的总效益，而这个总效益就可以作为一个公共项目的评价依据。

这一理论直接导致了作为成本效益分析基础的社会效益概念，由此开创了现代成本效益系统分析的方法，杜波伊特因此被誉为成本效益分析思想之父。

圆 福利经济学的诞生

1919年，阿瑟·塞西尔·庇古（~~英国经济学家~~）发表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它在奠定了福利经济学基础的同时，也成为西方项目评价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之下，研究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关系，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与福利的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政策问题，福利经济学研究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的资源的最优配置。

项目评价的基本思想是：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通常都会改变初始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福利水平，经济状态和社会福利水平或者是朝“好”的方向变化，或者是朝“坏”的方向变化。如果一个项目实施的结果可以改善经济状态，促进社会福利，则该项目就值得实施，否则就不值得。

现在的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经济状态的好与坏呢？在确定个人经济福利衡量方法——消费者剩余的基础上，庇古认为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命题：一是对于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都会使满足增大；二是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给穷人会使满足增长。由此，庇古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学说，其基本论点是，如果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社会福利就会增大。庇古把以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作为衡量全社会的经济福利的尺度，认为要研究经济福利必须研究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他认为资源最优配置和收入均等化是增进一个社会经济福利的两条途径。

庇古的贡献在于：第一，他把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从纯粹的财富转

变为社会的福利；第二，他提出了社会总福利的加总公式，即一国的全部经济福利等于全部个人的经济福利（效用或满足）的总和；第三，他指出了影响社会福利大小的两个因素——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第四，他提出了增进社会福利的两个措施：通过使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达到最优配置以使国民收入总量达到最大；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设施把富人的钱转移给穷人一部分，使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

庇古的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社会项目评价理论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猿 经典著作的发表

1952年，西方国家出版了三本关于成本效益分析方面有影响的重要著作：奥托·埃克斯坦（~~前苏联学者~~）的专著《水资源开发：项目评价的经济学》、克鲁蒂拉（~~法国学者~~）和奥托·埃克斯坦合编的一本案例研究——《河流开发的多重目标：经济分析的应用研究》、罗兰·迈肯（~~美国学者~~）的《通过系统分析提高政府的效率》。这三本书分别建立了水资源项目的成本与效益计算的准则，并试图把项目评价的实践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效益看成是福利（效用）的任何增加，把成本看成是福利的任何减少；第二，把成本看成是机会成本，从而成本效益分析的原则变成“使项目效益与由于选择该项目而放弃的效益之差达到最大”；第三，不但按照帕累托标准，而且按照潜在帕累托标准确定净效益的最大化。

其后，又有一些重要的专著陆续发表，如赫什利弗等人合著的《供水：经济学、技术和政策》等。这些在项目评价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论著不断发展和完善了项目评价方法的理论体系。

1.2 项目评价的实践发展

从项目评价方法的核心——成本效益分析法的产生、发展与应用过程来看，真正推动项目评价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政府的推动。

20世纪猿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

是自由放任，认为有供给就有需求，人们基本不考虑政府投资和公共事业的社会效益问题。然而，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粉碎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神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和恢复，政府对经济的指导作用日益增强，除了制定政策外，政府干预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公共投资。作为国外评价公共事业部门投资的一种方法，成本效益分析被应用于评价各种项目方案以及政策的社会效益，以证明某一项目或政策的总效益是否超过其成本。成本效益分析的应用，促进了项目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完善，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化的方法论，又促进了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项目评价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程序。

与理论的出台相比，项目评价的实践则迟至 20 世纪 40 年代才开始。这一时期，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在美国的水利和公共工程领域得到了应用与初步发展。

1.1 《洪水控制法案》的出台

最早把成本效益分析应用于项目评价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水利部门，目的在于评价与水利开发项目投资有关的成本和效益。193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洪水控制法案》开创了运用成本效益方法来分析、评价项目的历史。

法案宣称，控制洪水事关全民福利，控制洪水项目的效益应当包括所有个人得到的效益。联邦政府决定是否实施控制洪水项目的一般原则是：项目的效益必须超过其成本。该法案提出要检验洪水控制项目的可行性，要求“一个项目只有当该项目产生的效益大于相应的成本时才被认为可行”，明确了从宏观角度评价项目的经济效益。成本效益分析在《洪水控制法案》的强制性法律要求下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在指导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治理工程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该法案的局限性在于：第一，效益概念尽管定义得很宽，但不够具体，不够清楚；第二，与效益相比，成本概念又定义得过于狭隘，它实际上被局限于建筑成本，而不是社会福利的任何损失；第三，没有进一步阐明“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由于该法案没有提出一套前

后一致的方法来比较成本和效益，导致实际上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使用的是各不相同的方法。

圆 评价方法的逐步规范

随着许多不同的项目评价方法的纷纷问世，美国政府试图进一步使评价程序化。在这方面一个主要发展是 1965 年美国联邦流域委员会成本效益小组发表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报告，题为《关于流域项目经济分析实践的建议》，试图总结出一套各方一致同意的比较成本和效益的规则，并谋求在项目评价中使用福利经济学的概念。

这一文件曾被当时的水利工程分析人员视为项目分析程序准则的“蓝皮书”。该书引用了一些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并将不同的评价方法加以协调。虽然它未被上级委员会或相应的联邦机构完全接受，但这份报告为水资源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1965 年，美国预算局颁布了《统一预算周期文件》，正式提出了指导预算局评价预算的各种方案，在整个 1960 年代，甚至 1970 年代，该文件一直是项目评价的官方指南。但该文件的缺点是：它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社会效益，只强调了项目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而忽略了项目的收入分配效应。

经济分析的技术逐渐被引入美国政府预算支出的各个领域，甚至军事领域。例如，著名的兰德公司致力于发展军事支出方面的资源分配规则，在兰德公司的军事支出分析中，是用“国防安全”或“摧毁能力”来表示效益的。与此同时，一种以既定经济活动水平的货币成本最小化为目的的成本效果分析也发展起来。该分析中，成本用货币单位表示，但效果则以某些实物单位衡量或简单地用政策目标来表述。这一分析通过计算成本对效果的比率大小来比较为同一目的而采用的不同手段的优劣。实际上，成本效果分析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特殊形式，其区别在于，前者只是成本以货币表示，而后者无论成本还是效益均以货币表示，因此，在成本效益分析中，成本和效益可以相互比较，从而更具有一般性。

猿 评价领域和地域的扩展

这一时期，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逐

步实现了从公共工程领域向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扩展，同时也推进了由美国向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推广，特别是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工作主要是反映在1950年麦斯（Max）等经济学家、工程师和水利学家撰写了《水资源系统规划：将经济目标、工程分析和政策制订计划相联系的新技术》一书，该规划深入探讨了系统分析和计算机技术在成本效益分析领域内的运用，并使项目评价的实践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同年，多夫曼（Dorfman）出版了《测算政府投资的效益》，这本书首次在水资源领域以外，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20世纪50年代，在公共支出分析上作出贡献的其他学者有：赫尔希利弗（Hirsch）、德哈文（Dehaene）、米里曼（Mirman）、希契（Hitchcock），以及多夫曼等。随着一些研究和学术团体相继发表了一些优秀著作，项目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这一时期，政府也不断为项目评价制定日益严密的实用规范：1950年，美国参议院发布了文件《水土资源利用和发展计划的制定、评价及审核：它的方针、准则和程序》，作为成本效益分析的新规范。

在20世纪50年代后，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也开始采用成本效益分析。例如，英国在1950年把项目评价技术应用于分析伦敦—伯明翰公路的建设；1950年，英政府白皮书正式承认成本效益分析和它在国有化企业方面的有限作用。

1.1.2 传统成本效益分析的局限性

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法来源于福利经济学，其特点是：以国内价格为基础，运用影子价格技巧，从社会价值和社会成本的角度衡量项目价值；用折现的方法将未来值转换成现值，建立起一套衡量未来价值的共同尺度；设计各种指标用来测算项目的总体价值。

福利经济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于19世纪初形成于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和法国得到传播。1904年,马歇尔(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庇古(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了《福利经济学》(1904)一书,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创立。1914年以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意大利)在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创立了新福利经济学。

从项目评价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来源于理论福利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应用形式。因此,福利经济学为项目评价提供了基本概念、原理、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和福利准则,是项目评价的理论基础。

马歇尔认为,从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结论:即对报酬递减的商品实行征税,所得的税额可以大于所失的消费者剩余,而对报酬递增的商品实行补贴,所得的消费者剩余可以大于支付的补贴。研究消费者剩余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这种剩余的大小及其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关系,而在于说明怎样才能增加个人和经济的满足程度。这一点正是以后福利经济学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利用支付意愿代替市场价格衡量项目效益是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价的区别之一。如果一个项目的产出不能按照某一市场价格供消费者自由采购,或者该项目的产量很大并引起了价格降低,此时就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衡量项目效益,不然将缩小项目的效益。因为这时的消费者支付意愿是超过其实际支付值即市场价格的。但是,要用支付意愿来衡量项目的效益,有一个明显的困难,即需要调查项目产品的需求曲线的形状。当然,利用支付意愿衡量项目效益也有其好处,就是计量上的方便,因为它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以货币为统一计量单位,使总效益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叠加。然而,这个好处是相对的:首先,这种支付意愿所表示的价格能否真正地反映货物社会价值令人怀疑;其次,总支付意愿不能由各不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简单叠加而得,否则的话,就等于说现有分配状况是合理的,这又是令人怀疑的。

支付意愿和消费者剩余是基于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推导来

的。庇古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福利经济学说的，因此被经济学家称为旧福利经济学，而把庇古以后根据帕累托的序数效用论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运用数学表述方法，提出“最优条件”、“福利标准”的“客观检验”等理论的福利经济学称做新福利经济学。

序数效用论认为基数效用论关于效用可以计量、可以加总、可以比较的观点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既然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的主观心理评价，它就难以用基数衡量出来。序数效用论首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云里麻与莱姆~~）、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义里麻~~）提出来的，后来经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分里里里~~）、卡尔多（~~晕里里里~~）和艾伦（~~硬里里里~~）等人加以发展，构成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最适度，这个概念是新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新福利经济学的许多内容都是围绕这个概念发展、演化而来的。帕累托最优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在西方经济学界已被普遍接受，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分析。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内容是：如果至少有一个人认为经济状态 粤 优于状态 月，而且没有任何人认为状态 月 优于状态 粤，则就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状态 粤 优于状态 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准则是“无人反对，有人赞成”，它不要求全体赞成，而只要求有人（一部分人）赞成即可，它允许一部分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处于“无差异状态”。

对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分析工具是“消费者剩余”和“帕累托最优”概念。而帕累托在分析最优状态时又采用了同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埃奇沃思（~~云里麻与莱姆~~）使用的“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概念。

帕累托效率给出了经济学意义上逻辑严密的经济效率定义。但从本质上说，帕累托效率没有涉及个人间的效用比较或个人效用交换的可能性。一些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什么潜在的政策行动能满足帕累托效率。帕累托准则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公共）政策行为实施以后，如果没有人因此而处境变坏，但同时至少有一人因此而使处境变好，则这样的政策就符合帕累托效率。由于公共政

策（包括环境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会引起一些不可恢复的损失而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坏，所以帕累托效率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就失去了实际的指导意义。就是说，帕累托原理确定了一个在体制既定前提下判断社会改善的充分标准，然而，实际生活中大多数政策的变化会导致一些人境况改善但另一些人境况变糟，这时人们还能有一个确定社会改善的充分性标准吗？这就引出了补偿原则问题。

补偿原则是经济学家为了解决帕累托准则在实际中的“失效”问题而提出的，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1930年由卡尔多（~~1930年~~）和希克斯（~~1930年~~）提出的补偿原则，又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这一原则的内容可以表述为：设经济从状态 μ 转变到状态 ν ，一部分人得益，一部分人受损。如果得益的人能够补偿受损的人，从而在补偿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比在状态 μ 中更坏，则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状态 ν 优于状态 μ 。就是说，假定以政策 ν 的原有状态为出发点，如果引入政策 μ 使得该政策（ μ ）实施后所得到的收入增加不仅能对受害人进行补偿，而且补偿后还能剩下一部分净收入，那么从政策 ν 到 μ 的变动就是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改进。

显然，补偿原则使潜在的可能导致帕累托改进的政策行为范围更为扩大。如果这种补偿是在实际中必须发生的，那么这种改进就称为实际的帕累托改进，如果实际中不必付出补偿，则这种补偿只要求总收入增加超过总损失增加，此时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补偿原则的实质就是要求总收益大于总损失，显然，这也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

传统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从19世纪40年代到20年代占据西方项目评价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达40年之久，但随着项目评价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1）这种方法确定影子价格的根据——完全竞争假设是不现实的，垄断价格、政府作用和发展中国家低商品化程度的存在都使成本效益分析的应用受到了限制。

（2）评价的标准限制在新古典学派中福利经济学范畴，必然陷入逻辑分析的困境。因为，如果采用希克斯—卡尔多修改后的标准，则